

编者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本刊特设“习近平文化思想阐释专栏”，以“七个着力”重要要求为指引，围绕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组织系列文章，以理论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中国早期两大主流治世理念的生成文化背景及政治影响

郑杰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指出，中华文明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他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早期有两大主流治世理念，即“从古而治”和“从天而治”，它们都是顺应社会发展需求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理念。社会发展，治乱相依。周人灭殷，周公旦等用“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故后稷也像殷人先祖契那样是“神的儿子”，因而有做天子的资质；用“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论周文王、武王有德而殷纣失德，故而姬周应该享有天下，来回答周初“仇民”的质疑，平息他们的“心仇”；并为传扬“德政”而设立教导、监督、谏诤后世周王的训诫系统，换来西周前中期数百年的社会承平。

历史前进使社会形势变化，正如马尔萨斯“人口论”所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以算术级数增长的社会物质生产速度，越来越比不上以指数规律增长的社会人口增加速度。诸侯封域内初封时由于“地广人稀”所产生的“衣食无忧”局面，越来越受到挑战。于是为果腹而开垦的“私田”大量出现，导致“季氏富于周公”局面的形成和“初税亩”政策的出现，以致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代天封赏下民以土地”的传统理念崩塌，引发僭越公行、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的不堪局面，故而诸子蜂起以探寻治世理民、救人心的社会建构新理念。

综合看来，先秦诸子建构的社会治理理念主要有儒、墨等家的“从古而治”（或言“从先王而治”“从史而治”）模式，和道家（含黄老）、纵横家等的“从天而治”（或言“从四时而治”“从自然而治”）模式，它们各有不同的生成文化背景。

一 “从古而治”及其生成文化背景

“从古而治”的口号是“法先王”与“法后王”，即以前王治世、掌民的社会治理规范为准的来制订国家治理政策、方式、方法。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

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离娄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77页）主张在社会管理“规矩”的制订上学习尧舜，推崇尧舜之道，被称为“法先王”。“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制订社会管理“规矩”，这种治世理论的代表是荀子。荀子说：“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二《不苟》，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8—49页）又说：“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集解》卷三《非相》，第80—81页）与“法先王”相比，荀子的“法后王”更能适应新一统王朝社会形势的新需求。

孟、荀这种比照“过去”的“从古而治”的“向后看”治世思维方式，从理念发展溯源，可以追寻到周公和孔子。周公为了化解周初殷商遗民的“心仇”，论证周人执掌天下的合理性，顺应殷人“崇天”的传统信仰，宣扬周先王之灵在天、且后王能广大其业，说“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大雅·下武》，中华书局1991年版，下册，第791页），强调周先王之灵在天而周“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诗经注析·周颂·清庙》，下册，第934页），对过世的先王加以推崇。孔子接受这种治世思维方式，主“从周”论，盛赞西周礼乐制度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坚定地表示“吾从周”（《论语集注》卷二《八佾》，《四书章句集注》，第65页），正式确立“向后看”的“从古而治”治世理论模式，孟子进一步提出“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丰富了儒家“从古而治”的理论架构。

这种“从古而治”的“向后看”治世方式，从文化历史溯源角度看，导源于原始农业社会的“经验优先”发展模式。原始农业从采集经济发展到种植经济后，在同一片土地上，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欲求原始农业的发展，欲获得更多收获物，生产经验便成为主要决定性因素。播种时节的确立，每一生产环节的人工措施等，都离不开生产经验的积累与传递，因而曾出现“农业始祖神”崇拜。传说上古之时，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二，中华书局1994年版，上册，第51页），故被奉为农业的始祖，这正是崇拜“农业经验先导”的“传说性折射”。在姬周传世文献中，这种“经验先导崇拜”有更多的呈现。在《诗经》中，教民稼穡的后稷甚至被尊为神灵。《周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笺：“后稷之功能配天。”（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九《周颂·思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册，第1271页）清人金鶚谓：“配字，古与妃通。《尔雅》：‘妃，合也，匹也，对也。’《释名》：‘配，辈也。’然则配享之人，必相对相匹而后可。”（金鶚《求古录礼说》卷七《禘祭考》，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后稷身份可与天帝相匹，被尊为神祇，故《国语》谓：“辰马，农祥也……后稷之所经纬也。”（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5页）视其为农神。较之于儒家经典，未经过改造的《山海经》中的记载，可能更近于原始宗教文化的旧貌。其《大荒西经》曰：“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郭世谦《山海经考释·大荒西经》，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7页）由此推之，周是以谷物为主食的部族，稷始教民播种百谷，故被周人崇拜。这也是崇拜“农业经验先导”的文献遗留。

综上所述，在以尊后稷为标示的原始农业社会“经验优先”文化背景上，产生了以尊祖为特点的“向后看”治世理念，周公歌颂“有德之文王武王”，孔子“从周”设计“礼、仁、孝”三位一体的教化民众治世策略（拙文《试论孔子的社会治理构想》，《东岳论丛》1993年第1期），孟子号召“法先王”以设政，荀子力主“法后王”而设立“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建国方针（拙文《荀子的

国家管理一体化与社会经济一体化构想》，《儒林》第4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形成了一套“从古而治”施政理民的建国治国策略，成为传统治世理念的主流之一。

二 “从天而治”及其生成文化背景

中国早期还有一种治世理念，《鬼谷子》曾说：“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又说：“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持枢》，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9—240页）主张人君治世要仿照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运行法则，制订“生养成藏”政策，顺应自然规律，休养生息，使民有时，便民休息。《鬼谷子》成书时间学界尚有争议，我曾从文献对比角度加以考证，指出《鬼谷子》是战国后期既已流传的文献，它涵括了纵横家学说，应是先秦诸子文献之一（拙著《墨家与纵横家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1—543页）。因此，《鬼谷子》所论顺应自然“生养成藏”的运行规律制订管理国家的政策，可以说是中国早期治世理念的一种代表性论说。

这种治世理念论说，在纵横家以外的先秦诸子文献中亦可找到踪迹。

道家始祖老子主张人世应该效法天道自然，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37页），故应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64页）。又说人事应该遵守天道，否则便会失败：“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76页）因此，老子主张社会治理应顺天之道，不作人为干预：“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6—7页）又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51—152页），主张政治治理应该顺应自然态势。基于此，老子特别反对儒家那种以社会道德干预自然治理的治世理念，主张无为以御民，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49—150页）从老子的这些论说中，不但可以找到纵横家论说人君治世应顺应“生养成藏”之天道自然而不可“干而逆之”的理论源出，还可看到这种治世理念与儒家等以社会道德干预自然治理的治世理念的斗争残影。

老子开创、纵横家明确论说的这种顺应天道自然规律无为治世的社会理念的产生，有其自家的理论推导基础。作为老子学说继承者、丰富者的庄子提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所以他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吕惠卿撰，汤君集校《庄子义集校》卷七《知北游第二十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4页），认为人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生命过程，同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死过程是一样的，故而主张“万物一也”，即人的生命特质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命特质是一样的，都是“通下一气”的“气之聚”的形体，所以它们的治理方式应该是相通的，都应以顺应天道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这种理论，是超越儒家习用的“社会性类比式思维”，运用“跨社会的类推式思维”去观察整个人类生存空间后深度思考才得出的结论。

老子开创“人法自然”理念，庄子接而向“深层”发掘，论说“人法自然”理念的合理性在于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一样“通下一气”是自然界的一份子。纵横家就老子理念向“前方”开拓，发展为以“人法自然”的“生养成藏”运行规律来治世的理论，形成中国早期另一种可与“以古为治”治

世理念相匹敌的主流治世理念。

由道家开创而纵横家明确论述的这种用“跨社会的类推式思维”去观察人类生存空间并深度思考得出顺应“生养成藏”之天道自然运行规律以治世的理念，是在中国早期另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原始手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

与姬周是原始农业部族，故而能在商周之交那个仰韶温暖期后的第一个寒冷期靠粮食收买诸侯、聚集起伐纣联盟而代殷不同，殷商所用控制诸侯的手段是利用祭神器特别是青铜祭器的铸造特权，在那个“神学笼罩人世间一切”的时代，谁掌握了沟通天地民神的特权谁就是天下共主；谁的祭神青铜器愈精美、愈华贵就愈能获得神佑而给臣民藩属带来福祉。对此，张光直曾论证“商周的青铜礼器是为通民神，亦即通天地之用的”（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2页），并进一步联系甲骨卜辞所见及萨满作法为例，论证商周的青铜祭器上的动物植物纹饰是帮助作法者、祭祀者沟通神灵用的（《中国青铜时代》，第326—327页）。我们说，这与古人用龟甲兽骨及筮草占卜的原始理念相通，都是想借助动植物的“不可见”力量来沟通神界，获得预知，避祸求福。而这种借龟甲兽骨及筮草探求神意、铸动物植物纹饰于青铜祭器以求天、神佑护的原始理念的背后，所隐含的道理是“物人相通”，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乃至无生物在神灵面前资格是平等的，甚至认为某些自然界其他生物乃至无生物，较人更能通神灵而感知冥冥之中的神意，更能体现自然界早已固化的那些“规律”。这种原始理念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便蕴生出道家论说、纵横家完善的中国早期的另一种主流治世理念——“从天而治”理念。

三 “从古而治”和“从天而治”的政治影响

“从古而治”理念和“从天而治”理念，都曾在中国历史上被实践（或部分实践）过，因而产生过重大社会政治影响。

秦人重耕战、尚法治以集合国内力量，活用纵横术以利用国外力量，终破六国而统华夏。然其在已经变化了的、天下一统的和平状态中，却依然施行战争状态中适用的“重战尚法”国策，导致“天下苦秦久矣”而使民间起义蜂起，终致14载而忽亡。西汉王朝接受这一教训，更兼其基于族源文化基因所接受的长江冶制手工业文化的影响，在执政之初便认可“从天而治”的治世理念，施行黄老学说，实施“与民休息”的国策，是先秦诸子“从天而治”理念的首个实践者。

黄老学说托黄帝名义而实际上是发展老子“清静无为”、使民“自富”“自朴”之说而形成的“从天道自然规律而设政理民”的一种为政术。这种顺应自然规律而无为无作、无为而治却以静御动的统治政术，符合汉初社会安定民众、恢复经济的客观需要，故为从楚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汉初刘氏执政集团所采用。刘邦入咸阳后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以减轻秦王朝原有的苛法重役，开实施“从天而治”之端；后经曹参、陈平等推行，“从天而治”的治术遂获得实践机会。曹参为齐王相而“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从之说，首先在齐地实施“从天而治”的清静无为政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司马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册，第2029页）。萧何卒后，曹参由“齐相”而晋升汉王朝相，继用“从天而治”的无为政术治理天下，大得民心，故百姓歌曰“载其清静，民以宁一”，也获司马迁赞许“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6册，第2031页）。曹参之后，有“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的陈平继为丞相，继续用“理阴阳，顺四时”“育万物之宜”的“从天而治”政术来治理天下，亦终称“贤相”（《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第6册，第2061、2063页）。直至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倡导儒学（《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

传》，第10册，第3118页），才使黄老学退出宫廷，“从天而治”的治术理念也随之淡出执政者视野。

汉初接受“从天而治”理念而实施的“与民休息”政策，虽然使得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元气，出现“文景之治”的盛大局面，但也由于遵循“顺天”“无为”的“从天而治”执政理念，以致滋长政治分裂，导致诸侯坐大、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出现。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惊醒了执政王朝，故汉武帝支持国相田蚡绌黄老而倡儒学，用儒生，举贤良对策，欲以儒术治国。董仲舒把握住执政集团的这一现实需要，用长江流域冶制手工业社会生产基础上生成的“天人哲学”框架，装入先秦儒学中的社会政治治理理念，对《春秋》等儒家经典重新阐释、发挥，对儒学进行理论改造，建构起新儒学体系，并为具有楚文化基因的西汉王朝所接受。汉武帝实施“独尊（新）儒术”政策，进而罢黜百家，使得“从古而治”的政治理念获得实践机会，逐渐成为主导中国乃至周边汉文化圈长达两千多年社会治理的主流政治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每种历史存在都有其社会合理性。从今天来看，由原始农业“经验优先”基础上生成的“从古而治”和由原始手工业“物人相通”基础上生成的“从天而治”，都有各自生成的文化背景，都曾被用于社会治理实践，都曾对中华文明发展作出过贡献。一张一弛之谓道，这两种治世之术，也为后世国家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与路径

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为新时代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赓续民族血脉、坚持中国道路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重视。“讲话”集中系统地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观，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其中有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特性的概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为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属性，提供了崭新视角。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自身的丰富性、多样性，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具有极大的拓展和深化作用。“讲话”所发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倡议，是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提出的新要求，需要文化研究者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

发掘和揭示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首先是为了更加全面正确地认识我们所持文化传统的伟大，增强和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讲话”所概括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作为相辅相成的五个有机要素，对我们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往未曾看到、或因某种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影响而受到遮蔽的许多重要面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例如，受近年来盛行的区域研究、个案研究影响，中国文化的统一性问题被不少学科忽略，甚至遭到排斥，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性、差异性话题的热烈讨论。这样的研究，在深入揭示地方文化的内在属性，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等方面，取得